

=====
文革博物馆通讯（八二〇）·华夏文摘增刊第九八八期（zk1504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读史随笔】	风雨摧不垮思想——读忻鼎亮自述引起的思考	华新民
【人物春秋】	胡乔木在文革末期	张成洁
【不堪回首】	谭厚兰曲阜“讨孔”纪实	张顺清
【永志不忘】	一所高校清查“五一六”的惨剧	朱子南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读史随笔】

风雨摧不垮思想
——读忻鼎亮自述引起的思考

· 华新民 ·

一，“老三届”和“老五届”的文革回忆

笔者关注文革历史资料的收藏和研究，包括参与建立和运营《华夏文摘》的“网上文革博物馆”网站将近有二十年时间了。这过程中注意到一个现象：大体上说，二十年前，对我们的博物馆热烈支持、向我们提供资料、投送稿件的人多是文革开始时在校的中学生，习惯上称为“老三届”。他们的回忆、争论集中在以下几个话题：早期红卫兵和他们的暴力行动，“对联”、血统论及中学里的派别斗争，当然还有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最初的时候，电脑网络的中文交流还在起步阶段，当年有的“老三届”网友没有中文书写软件，或者不会中文输入，但是挡不住他们倾诉自己文革经历的强烈愿望，常常把手写的稿件邮寄给我们，再由义工将它们输入为电子文本发到网上传布，他们当年的执着可见一斑。相形之下，文革开始时在校的大学生，习惯上称为“老五届”的，他们的回忆和讨论，不免显得有点冷清。

“老五届”对于文革历史的回忆和反思落后于“老三届”的弟妹们，在笔者看来，同他们在文革后期以及文革结束后的境遇有关——他们中许多人虽然和中学生一样，毕业后也有一段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经历，还发生过在广东牛田洋劳动的众多大学生死于台风海潮的大事件，但那是作为“国家干部”的劳动锻炼，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和明确的期限，而不像中学生那样只看得到“一辈子扎根农村”的前景。所以到文革宣布结束的时候，他们大部分已经在厂矿企业或机关从事或多或少的专业工作，也有了家庭，不像中学生那样还要为返城抗争以及回城后面临成家立业等困境。在此后的二十几年时间里，“老五届”人在社会上已经占有了大致稳定的地位，不必像许多“老三届”人那样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为免于贫困和下岗而挣扎。艰难困苦，使得“老三届”人难于和过去年代告别，反而更加急切地向人们诉说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坎坷人生和思考。玉汝于成，也造就了他们中不少著名的作家和反映那段历史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相比之下，平稳的生活加上当局不鼓励反思文革的大环境使“老五届”人缺少

了回到过去的动力，忙碌的工作也使他们无暇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程。更重要的是，“老五届”中有一个群体在文革后的遭遇同“老三届”中的相应群体有天壤之别，这就是当年大学里的学生领袖，他们本来是最有“故事”的一群人，但是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文革后作为“三种人”重则判刑，轻则禁言。而“老三届”里的学生领袖，则完全没有受到政治惩罚，有的甚至被重用，培养成接班人。大学里的学生领袖被迫沉默，使得“老五届”人在早期的文革回忆活动中失去了主力和带头人。

这种情形，到最近十来年，有了大的改观——入狱的刑期已满，禁言的威慑渐消，北京和外省的许多高等院校文革中的学生领袖以及积极分子，逐渐加入到回忆和反思文革的活动中来。与此同时，广大的平稳度过文革时代的“老五届”人则逐渐进入退休年龄，也有了空闲的时间，来回首似烟非烟的往事。不管属于那一类人，当他们在晚年回顾逝去的岁月年华的时候，无不痛心于自己在青年时代不幸躬逢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个人的人生道路毫无例外地因此而改变：读书时学业中断，运动中被利用后遭抛弃，毕业后成为“臭老九”备受歧视，专业知识无用武之地，个人抱负难以伸展，……。总之，他们后来的种种遭遇都和文革脱不了干系。同时，他们也意识到，经历文革这样“史无前例”的变局，固然是人生不堪回首之不幸，也未尝不是一种可作为后人镜鉴的精神财富。把自己的经历和思考记录下来，使之成为整个民族精神遗产的一部分传诸后世，对于今后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子孙后代的这种责任感促使他们纷纷撰写回忆录，或在境外发行，或在网上交流。近年兴起的校友聚会活动以及网络通信的普及，也为激活往事的回忆、促进思想的交流提供了平台。

最近几年里，“老五届”人在网络和传统的书刊中发表的各种反思和回忆，在数量和质量上同“老三届”人相比，已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些纸媒或网络的出版物现在已经难以一一列举，依笔者挂一漏万的观察，仅北京高校学生领袖的长篇个人回忆录，就有清华大学蒯大富的《清华文革五十天》、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孙怒涛的《良知的拷问》、叶志江的《走出文革》；有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以许爱晶的笔名）所撰《清华蒯大富》，戴维堤的个人回忆《逝者如斯》；有北京地质学院的聂树人的《“地质东方红”“兴亡史”等系列回忆录。外省学生领袖的回忆录有重庆大学周孜仁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有合肥工业大学梁守福的《乱流浮沉半生缘》，哈尔滨师范学院范正美的《秋梦追思》等等。集体的文革回忆资料汇编则有北京大学的《燕园风云录》、《告别未名湖》和清华大学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水木风雨——北京清华大学文革史》等。至于网络上的篇幅较短的个人回忆和评论，更加不计其数。

二，科大学生的文革回忆

在这众多的个人回忆录中，作为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友，我特别注意该校学生对“一打三反”运动的几篇回忆。在1968年军宣队、工宣队开进校园到1971年林彪出逃事件之间，高等学校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三项大的运动，就笔者对各校师生回忆的阅读所及，似乎“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两项运动对高校的师生为害最烈。“一打三反”运动相对而言在学校里涉及面较小，然而这几篇科大学生的回忆却改变了我的印象。这些回忆包括：

- （1）朱柏生：“不堪回首的安徽”，（载本刊zk1412a），
- （2）周景生：“我亲历的科大人逆境相助”（载本刊zk1205a），
- （3）梁伟清：“《湖殇》——白湖蒙难四十四年祭”（载本刊zk1205a），
- （4）孙进和：“致聚会同学——回忆‘一打三反’”（载本刊zk1503a），
- （5）忻鼎亮：“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连载于本刊zk1503a及以后几期）

他们的回忆基本上都讲了同一件事：中国科技大学在1970年南迁到安徽省以后，在当地的工宣队和军宣队所主导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不堪回首的遭遇。

其中忻鼎亮所写的《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以下简称“风雨中”）又是引起笔者最多思考的一篇。忻鼎亮是我的大学校友，而且同系，比我晚两年入学。已经不记得最初如何相识的，说明时间很久远，至少是在文革初期就认识了。但是因为不同年级，我要比他早毕业两年。这两年对于科大学生来说差别很大：我毕业时学校还在北京玉泉路的旧校址，而他毕业时学校已经搬迁到了安徽。而“风雨中”的主要内容就是讲他和同学、教师们随学校搬到安徽以及后来的遭遇，这恰好是笔者所知不详的一段历史。他和其他同学们对“一打三反”运动的回忆让我产生一种“假如当时我没有离校”的不寒而栗的后怕，并从科大师生的遭遇联想到安徽省文革历史中两个闻名全国的案例：一个是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1968年自杀身亡后，剧团的军代表竟然要求医生对严开膛剖肚寻找“特务”作案工具；另一个是固镇县的基层干部方忠谋在1970年——正是“一打三反”如火如荼的年份——遭到自己的丈夫和中学生儿子举报，在两个月之内以反革命罪处死。这些案例，加上忻鼎亮及其他同学对于“一打三反”运动的回忆，使得安徽省的文革运动呈现出特别恐怖狰狞的面貌。人们不禁会发生联想：安徽省文革运动的残酷性同这段时间的安徽主政者——李德生——从一个军长急剧升迁到中共中央副主席高位是否有着某种联系？

笔者之所以要写这样一篇随笔式的感言，还因为在阅读“风雨中”的过程中强烈地感受到此文在回忆和反思方面具有同类文章中不多见的特点。举例来说，作者在回忆自己在运动中被整的时候，没有把整人者作妖魔化处理，而是描写了制度造成的精神恐怖和整人机器的纯熟技巧，另一方面，作者对自己被整的过程中如何屈从、投降也毫不讳言，坦诚地展示了自己难堪、尴尬的负面形象。这样的秉笔直书对中国政治中整人运动的机制、危害性和制度性原因所作的深入挖掘和分析，相信对政治学者、历史学者都有不可多得的启示作用。可以说，“风雨中”无论在回忆的真诚、反思的深刻方面都不亚于前面所列举的那些文革“名人”回忆录中的佳作，如果不是质量更高的话。

以下，笔者想跟大家分享阅读此文引发的万千思绪中感受最深的两点。

三，文革中思想变异的脉络

忻鼎亮的“风雨中”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其中详细地回顾了自己在文革中思想变异的脉络。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大部分是对运动中一些事件的回忆和辩论，尤其是北京高校学生领袖的回忆录，对于高层领导以及重大事件常有详细回忆和披露，从研究运动过程的角度来看具有颇高的价值，但是这也使得有些回忆录不免像是文革“大事记”，而对于这些学生在运动中思想活动的叙述则显得较为单薄。忻鼎亮的“风雨中”的特点之一，是对于自己在文革进程中的思想变异作了详细的回顾——

他在文革前同绝大多数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一样，对毛泽东有高度的崇拜。在文革初期，由于他的独立思考倾向同政治指导员有一些小的抵牾，加上一时的冲动，起而造反，恰好同毛泽东在发动群众时采取的策略相呼应，因而有一段时间显得站对了队，于是误以为“自己是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并且“总觉得毛主席会支持我的想法”。

然而，“毛主席67年秋后一系列指示发表，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理解的毛泽东思想是错的”。在忻鼎亮的自以为是的“毛泽东思想”里，哪些是“错的”呢？他和他的战友们原先以为“走资派就是因为脱离群众地位改变后变坏的”，从而“坚定地认为不受群众监督的领导最容易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并误认为这是理解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义。”然而，到1967年秋季，他们从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中体会到，“毛泽东及其文革追随者的意思是：这些‘走资派’并不是因为地位改变而变坏的，而是原来就是混入党内的坏人，所以受到严厉惩治

的不是建国后劣迹斑斑的贪官污吏，而是当年国共斗争中有过污点的‘叛徒’、‘特务’，而只要忠于毛主席，不管如何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甚至镇压群众，都无关紧要，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准炮打！这和我信奉的‘炮打司令部’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尤其使他们不能理解的是1968年春季发表的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新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他们的疑问是：“怎么能说文革是两党斗争的继续呢？莫非刘少奇、彭真等代表了国民党？或者说是受蒋介石委派的？反修防修又怎么解释？苏联变修也是受了沙皇势力的影响吗？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与我以前对文革的理解完全大相径庭，甚至是对立的。”

今天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和中期出于不同时期的策略需要而偷换文革宗旨的一种手法——文革初期，他在“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里宣告“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用“反修防修”的口号把“做官当老爷”的干部阶层端出来让群众揭发批判，同时也部分解除了国人在1957年反右后形成的怕运动整到自己头上的后顾之忧。同时，正如“风雨中”所说，“十六条”的第五条讲党的阶级路线，一反共产党执政以来的习惯做法，完全没有家庭出身、“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这类词语，而只讲依靠左派，团结大多数，孤立右派。这就在缺乏经验的青年学生面前展现了一种只要积极投入，人人都能当左派的虚幻前景，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的目的。而到了1967年夏天，“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已使刘少奇成为过街老鼠和砧上鱼肉，群众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武汉“七二零”事件也使毛泽东亲身感受到了军政干部对他的强烈不满。于是在秋季后，毛泽东一方面抛出王、关、戚等“小爬虫”作替罪羊，一方面悄悄更换文革的内涵，在1968年春季把它抛出来，将文革重新定义为是国共斗争的继续，既可安抚和回收那些跟着他向国民党夺权的老干部的人心，也是为他最终抛弃造反派、把斗争矛头重新转向群众埋下伏笔，成为此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等几项运动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1966年到1967年秋季，再到1968年春季的两年时间里，如此玩弄文革的定义，也许只是他在一生政治博弈中不动声色的一步平常棋。可是忻鼎亮和他的同伴却发现了1967年秋后的毛泽东思想同1966年的毛泽东思想的“大相径庭”和“对立”，在他们有点“一根筋”的头脑中引起了一场十二级风暴：“我感到极其灰心，而且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我最崇拜的领袖居然在使诈，为了打到政敌竟欺骗全体国民发起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造神整人运动！我当时的情绪就像祥林嫂用斧头砍庙门的门槛一样，对毛泽东从崇拜到失望转至反感”。也就是说，他们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产生了怀疑！笔者回忆当年读到毛泽东将文革归结为国共斗争继续的“最新指示”时，也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1966年的毛泽东文革理论，是整共产党内的走资派，用林彪的别扭而又一针见血的话概括，就是“革从前革过的命的命”，这样的“理论创新”确实使得许多觉得自己没赶上革命年代的青少年热血沸腾。可是1968年的毛泽东却把文革重新回归到国共斗争，那不就是“从前革过的命”吗？那还要文化大革命干什么呢？正如忻鼎亮所说，毛的急转弯“促使自己积极投入文革运动的支柱信念轰然倒塌。”

毛泽东把发动文革视作自己一生两大功业之一。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为了挽救文革在人们心目中每况愈下的地位，他知道不能单靠“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这样强词夺理的口号。于是公开发表自己在文革前的一些内部批示，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请注意，这些话又否定了文革就是国共斗争继续的说法，重新肯定走资派是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目的是把丢失的人心收拾回来。但是，1966年时受他文革学说感召的人们已经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等运动中遭到了几乎

灭顶的灾难，新发表的“最高指示”尽管言辞上比1966年的理论说得更凶狠，但是除了报刊电台的鼓吹以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同1966年那种万众欢腾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曾借用罗隐在《筹笔驿》中的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来表达自己的无奈，却不知道检讨，以“英雄”自况的他之所以“不自由”，就是因为“时来”的早些年里文革的宗旨变换得太“自由”了，致使人们头脑里的信念崩塌，相信他的人越来越少。

近些年来，崇拜毛泽东和怀念文革的思潮在中国官民中颇有市场，它与中国的社会现状有密切的关系，本文不拟作详细的分析。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毛派”人士在重新掀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时，常常引用毛泽东在1966年关于斗争“走资派”的言论和临终前不到一年时间内发表的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语录作为理由，说明毛泽东的“英明远见”和为底层群众争取权利的“伟大胸怀”。他们不知道——或者装作不知道：从1968年各地革命委员会建立一直到1975年末“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发起了多次运动，包括“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等，这些运动的打击对象，除了他在高层的政敌——林彪军人集团以外，大部分都是原本就处于底层的“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统计资料表明，在这段时间内上述运动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远超过文革初期的“走资派”死亡人数。也就是说，文革十年中有七八年的时间，毛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同“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斗争，而是同“国民党”的斗争。

对于“伟大领袖”的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说辞，忻鼎亮等人本来可以像别人一样，闭上眼睛，停止思考，继续“紧跟伟大领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毕竟，掌权者在历次运动中像“变脸”一样变换各种口号，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常态”，大多数惯看“秋月春风”的人们，遇到自己思想跟不上反复无常的口号时，学会了用“辩证法”——其实就是见风使舵——来说服自己和别人，从而成为始终紧跟形势、总是“站对队”的政治不倒翁。可是总有少数人对朝秦暮楚的政治口号敏感而较真，在多数人的眼里就成了“僵化和不懂辩证法”的人。忻鼎亮和他的同伴们正是这样一群不愿扭曲自己的“引而上学”之徒。在这样的思想方法指导下，他们同当时造反派的主流渐行渐远，开始了“认真读书生涯”。读书和讨论的结果是“无法在异端的思想道路上踩住刹车”，导致了后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灭顶之灾。

像忻鼎亮这样对自己的思想演变有如此详细、清晰的回顾，在笔者阅读过的个人文革回忆中，是少见的。他的叙述有助于回答这样一个文革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为什么在1966年的时候得到了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万众一心的拥护？可是到了1976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中，他本人和他领导下的中国，被示威者影射为“秦皇的封建社会”，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许多论者和个人的回忆都把这种变化集中在一个关节点：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固然，林彪的出逃是对毛泽东的政治信誉和威望的沉重打击，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清楚，以至于事发之后大病一场，文革也从此一蹶不振，只是拖时间而已。但是忻鼎亮的自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文革从轰轰烈烈的开场到冷冷清清的收场，演变在九·一三之前即已开始，毛泽东的每一个出尔反尔的最高指示看似任性自如，人们都“热烈欢呼”如仪，实际上也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使得一部分拥护者成为怀疑者，只是在当时“道路以目”的社会氛围下，这种怀疑只能深藏在个人的心底，缺乏交流，只有像忻鼎亮这样的少数人才达到透彻的认识，而九·一三这样的突变事件则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得已经日渐侵蚀的毛泽东神坛大面积崩塌，让那些怀疑者冲破自设的精神牢笼成了异端者。这种人心的变化在文革过程中是如何积累的？换句话说，毛泽东的人心是如何一步步流失的？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迄今还没有得到文革史家像研究九·一三事件一样的关注和投入。

四，思想型“红卫兵”

忻鼎亮回忆录的价值还在于，它提供了所谓“思想型红卫兵”的文革历程的一个完整案例。

严格地说，忻鼎亮和同伴们只是成立过一个《齐卫东》战斗队，参加了本校的《东方红公社》，并没有正式成为红卫兵，这里把他归入“红卫兵”只是在广义上用来指当年的青年学生，而且属于一群没有多少名气的青年学生。红卫兵中的名人之所以有名气，都是因为他们领导过人数众多的团体和影响深远的活动，在大事件中出过风头，如北京大学生中的“五大领袖”，可以把他们归属于“行动型红卫兵”。这些长于行动的名人常常缺乏思想的深度，他们中同时又敏于思考者不多，大学生中的朱成昭庶几近之，中学生中杨曦光（杨小凯）可能算是唯一的一个有名气的“思想型红卫兵”。回顾整个文革过程，正如忻鼎亮在文章的标题里所说的，“思想型红卫兵”常常落个“思想犯”的下场，因为他们就是前边说过的那种“不懂辩证法”的人，这个事实也告诉人们，文革并不是一个有些人所说的那种有思想自由的时期，而是“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全面专政”的时代。

“思想型红卫兵”名气不大，但是他们的影响有时却未必小于那些行动型的领袖人物。忻鼎亮就是这样一个不是学生领袖、却对文革进程和思想潮流有不小影响的“思想型红卫兵”，他们的影响不是表现在“登高一呼，应者云集”，而是表现在以透彻的说理传布自己的信念，用马克思的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

忻鼎亮在文革中的影响力可以从两个时期里看出来，其一是运动初期，他和伙伴们到上海去串连时对徐景贤的影响。这方面他在“风雨中”一文里谈得不多，但是在徐景贤撰写的、逝世后由他的家人出版的《最后回忆》一书中，有相当详细的回忆。徐景贤在该书的第三章“红卫兵运动对我的冲击”中这样说：“我在红卫兵接待站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接待北京红卫兵时，和几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有了较密切的交往，他们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许小昆、忻鼎亮和北京大学的胡轲等人。”“许小昆和忻鼎亮都只有二十出头，比我要小十来岁，戴着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但讨论起问题来却十分认真，甚至有些咄咄逼人。……我的强烈感觉是：他们要对我进行造反的‘启蒙’教育。我并不厌烦他们，相反我觉得他们无私、真诚，没有个人的功利目的，一心一意地想要宣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他花了颇长的篇幅回忆他当时作为上海市委体制内干部同许小昆和忻鼎亮二人一来一往的辩驳，并得出如下观感：“我感到这些大学生真会思索，真有‘思想’。他们在政治上的思考比我深入，和他们的年龄很不相称。”“我不得不垂下头来，从内心表示折服：这些年青人来到上海，……他们只是想宣传他们最忠诚坚信的毛泽东思想，他们只是想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付诸实践。当时他们对毛泽东的学说表示无限的信仰，而我也和他们一模一样，对毛泽东的每一条‘最高指示’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相信到了迷信的程度。”

徐景贤承认：“我和北京红卫兵的友谊，对我后来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确实起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忻鼎亮和许小昆正是这些“北京红卫兵”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二人。徐景贤在上海文革中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他作为一个低层干部从市委机关内部揭竿而起，敲响了上海市委的丧钟，成为上海文革的转折点。他在文革中后期被人称为“徐老三”，在上海的地位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控制文革基地上海的直接执行人。而不为人知的是：在背后促成徐景贤反戈一击起来造反的，竟然有两位北京来的大学生的影响！是忻鼎亮和许小昆以毛泽东关于文革的学说折服了徐景贤，才有了后来发生的一切。当然，这里所说的“毛泽东的学说”是忻鼎亮和许小昆等人在1966年所理解和信仰的。1966年的毛泽东文革学说能够使一个共产党内颇有理论修养的干部折服，固然应归功于此学说本身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理论上的彻底性，许、忻二子的辩才也功不可没。

有意思的是，1970年，徐景贤在上海的权力如日中天。当他作为上海的实权人物执行中共中央1970年三号文件，在全市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时候，他当年的“革命引路人”忻鼎亮和许小昆却正在安徽被当作反革命小集团的反派主角在全校游斗，在组织批斗他们的工宣队中，也不乏安徽省工矿企业的造反派头目。革命的先行者成了反革命，而追随者却还在“继

续革命”道路上与时俱进，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最有名的莫过于陈独秀，这位所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启蒙者和领路人，后来被追随他进入共产党的人加上种种反革命的罪名而逐出组织。但是陈独秀并没有因此停止思想，反而在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束缚之后有了更深入的反思，走上了信奉民主政治的道路。

忻鼎亮也是这样，在毕业分配到河南省兰考之后的日子里，劫后余生的他并没有放弃独立思考和认真读书的习惯。他在此期间“补看了几乎所有的中外名著，还接触了萨特、弗洛伊德、悉尼·胡克、德热拉斯等政论和哲学著作，顿时感到眼界大开，自觉思想境界又深入了一步。”他对中国走向自由和开放的前景有了更坚定的信心：“我越来越感到这样的专制制度肯定长不了。一旦龙归大海万寿有疆之时，应该能看到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在这个思想成熟的过程中，他也通过同上山下乡的“老三届”知青的交往，影响了不少年轻人的思想，这就是忻鼎亮对文革发生影响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些受他影响的年轻人中，曾在兰考地区插队落户、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朱学勤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个，忻鼎亮回忆：“我和他在开封陋室里谈了三夜，详述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我从自身经历谈起，按我独特的理解分析整理文革的脉络的各类典型事件。朱君听得十分投入，并不时发问，许多内容他都记得很牢，多年后都能具体谈及。据说他回巩县后，曾把我的谈话内容作了认真的回忆并作了书面记录，从此开始了正式的对文革资料搜集和研究。”另外，忻鼎亮还对朱学勤系统地讲述了《南共纲领》的主要内容。

事实上，笔者在这里称忻鼎亮为“思想型红卫兵”，也是沿用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里的说法，他在该文中说：“一九六八年前后，在上海，我曾与一些重点高中的高中生有过交往。他们与现在电视、电影、小说中描述的红卫兵很不一样，至少不是打砸抢一类，而是较早发生对文化革命的怀疑，由此怀疑又开始启动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我把这些人称为‘思想型红卫兵’，或者更中性一点，称为‘六八年人’。”朱学勤说的是1968年前后对他有过影响的高中学生。而朱学勤同忻鼎亮交往则是在他兰考插队落户以及后来到巩县工作期间，时间应是1971年林彪出逃事件以后，此时社会上以及青年中对于文革的见解和思考比68年的怀疑自然大大进了一步，在当年的大学生中流布则更为广泛，只要读读上面列举的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对于“一打三反”的回忆录，就可以发现，即便在林彪出逃事件之前夕，有这样的怀疑甚至异端思想的学生已经占相当高的比例，他们的思想使得那些工宣队和军宣队员惊呼“枪毙几次都不为过”，这样的话虽然有无限上纲的威吓成分，也反映出学生思想的大胆和“反动”程度。就这样，从文革的回顾和思考到国际共运和“无产阶级专政”本质，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亦师亦友的忻鼎亮把大学生中的思潮传到了刚脱离少年时代的朱学勤这一代人那里。

从“策反”徐景贤到“传道”朱学勤，忻鼎亮的文革历程在前期和后期表面上似乎走了两条相反方向的道路：前期是鼓动徐景贤紧跟毛泽东投入文革造反运动，后期却是向朱学勤等知青散布质疑和反对毛泽东及文革的思想。然而详细察之，就会发现它们的背后有着前后一致的思想脉络——就是反对特权、主张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当初折服徐景贤的是1966年的“毛泽东思想”：实行“大民主”，批判走资派，恰好和忻鼎亮头脑里的思想倾向相契合；后期传递给朱学勤的则是对毛泽东专制主义和政治特权的厌恶。实际上是毛泽东本人，起先为了发动群众，把文革的重点说成是斗争“走资派”，过了两年，又把文革说成是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走了南辕北辙的两条路。

忻鼎亮所持有的这种一以贯之的思想在文革后的开放环境中，同涌进国门的自由民主思想潮流交融汇合，成为今天人们所说的“普世价值”。“风雨中”一文通过一个学生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普世价值并不是凭空从西方传进来的，而是深植在人性的向往之中，虽然在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中遭到一再剿杀，但是文革的狂风暴雨并未阻止它萌芽于地下，文革后破土而出，在今日中国的各种重要思潮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深刻影响着未来的国家走向。

2015年4月6日

~~~~~  
【人物春秋】

胡乔木在文革末期

• 张成洁 •

1975年年初至1976年年初，胡乔木因邓小平的关照曾有过短暂复出，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后又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受到批判。胡乔木上纲上线地写了十八条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想挽回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无奈形势瞬息万变……

◇ 参与1975年整顿

1973年，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2月初，邓开始代生病的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就在邓小平即将主持国务院工作前，1月6日，邓小平找胡乔木谈话，要他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任国务院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这时，意识形态领域仍然由“四人帮”把持，中央的“两报一刊”、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文化部，体委，北大，清华两校，辽宁和上海两地等都是“四人帮”直接控制的。邓小平正着手部署各方面整顿工作，他知道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同“四人帮”抢夺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性。这次谈话后，胡乔木即出席1月5日已经开始举行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接着出席1月13日至17日的大会，自此恢复了正常的政治生活。

1975年上半年，邓小平的治理整顿工作已显露成效，但由于舆论宣传掌握在“四人帮”手中，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央圈发的文件，在报刊上都得不到宣传。所以，无论是整顿的进一步开展，还是同“四人帮”的进一步斗争，都需要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工作的支持。恰好此时，负责整理《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康生病重，胡乔木被吸收进整理队伍，这是一个最佳时机。6月8日，邓小平再次找胡乔木谈话，借编《毛泽东选集》第5卷工作之事，打算正式成立一个写作班子——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按邓小平的设想，政研室和《毛泽东选集》整理小组是两个机构，一套人马。胡乔木提出，是否多找些“革命造反派”加入，被邓小平坚决地拒绝了。10月中下旬，邓小平挨毛泽东严厉批评后，胡乔木11月10日又提出，是否要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邓小平坚定地说：不要！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妥协。邓小平提出，政研室成立后要“代管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显然，邓小平是要通过政研室掌握我国最大的、有组织的社科队伍的领导权。胡乔木表示负担不了。邓小平坚决排斥“造反派”加入，并要求政研室“分管学部”，其意图就是要建立与“四人帮”对垒的舆论阵地。显然，胡乔木不想直接与“四人帮”唱对台戏，怎样配合毛泽东才是他的固定思维。

从另外两件事情也能看出来。第一件事是，1月6日谈话后，胡乔木于2月28日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说到解放初期毛泽东曾要他写一本关于唯物主义的小册子，一直没有写，觉得非常对不起毛泽东，现在想写写看，请求组织上考虑能否允许给他配备一两位助手。邓小平在6月8日的这次谈话中告诉胡乔木：这封信已送主席和中央各常委传阅过，主席也同意了。邓小平说：现在别的工作更重要，这事暂时放一下，以后再说吧。邓小平说的更重要的别的工作就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社会主义前途的1975年整顿。另外一件事是，胡乔木在去编《毛



泽东选集》第5卷之前，正在组织几个“隐士”编学习毛泽东理论指示的材料，胡乔木出了一批题目。参加者有邓力群、陈禹、冯兰瑞等人。最后编成一本《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后因政研室成立，就未继续进行下去了。

7月5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负责人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7人。后来政研室发展到近50人，设有理论组、国内组、国际组、办公室和图书资料室等机构。政研室成立仅4个月，在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政研室做的事情主要有4方面：第一，编辑《毛泽东选集》第5卷。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和李鑫主要负责这方面的编辑工作。邓小平首先选择了毛泽东一篇最重要的讲话《论十大关系》进行编辑，当然邓小平选择这篇文章是为治理整顿提供理论支持的。邓小平对胡乔木整理加工的这份稿子非常满意。7月13日邓小平上报毛泽东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毛泽东批：可以印发全党讨论，暂时不要公开，将来出选集再公开。这篇整理的《论十大关系》等于就此搁浅了。据邓力群回忆：在编辑整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时，胡乔木和李鑫争论得很厉害。胡乔木主张改得多一点，李鑫主张改少一点，保持原貌。

第二，意识形态领域同“四人帮”的斗争。政研室成立后，开始收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材料，因为这时毛泽东也开始转向意识形态领域，开始试图调整文艺政策。政研室收集的材料有：上送“四人帮”砍掉“百花齐放”和宣传“三突出”的材料。转送《创业》编剧张天民的申诉信和《海霞》主创人员给毛泽东的信，得到毛泽东关于这两部影片放映的批示。转送周海婴、姚雪垠给毛泽东的信，使鲁迅著作和小说《李自成》的出版提上议事日程。转送冼星海夫人给毛泽东的信，使冼星海和聂耳的纪念音乐会冲破“四人帮”的阻挠如期举行。抄转李春光的大字报给毛泽东。这些材料基本上都是通过胡乔木转邓小平，然后转毛泽东的，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这段时间，“四人帮”基本处于劣势。9月中旬，政研室围绕评《水浒》与“四人帮”进行了一次斗争。“四人帮”借毛泽东评《水浒》向周恩来、邓小平发难。邓小平召开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时，江青在大寨大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遭到毛泽东批评。

第三，代管学部，筹办《思想战线》。政研室7个负责人中，胡绳分管学部。胡乔木给国务院打报告调了一些人手，组成了学部党组。胡乔木还专门给党组召开了一次会议，谈《思想战线》怎么办的問題。胡乔木说，这个杂志要全面宣传党中央的指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目前报刊上丢掉了毛泽东三项指示中的“安定团结”和“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个杂志要全面反映各项指示、各条战线。由于形势的恶化，1976年1月17日，胡乔木起草了一封给邓小平、张春桥等的信，请求国务院解除委托政研室代管学部的责任，并建议暂缓出版《思想战线》杂志。所以该杂志一直没有出来。

第四，起草或修改了被“四人帮”诬称“三棵大毒草”的三个重要文件。这三个文件是《科学院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科学院汇报提纲》是胡耀邦起草的，因语言太尖锐，邓小平要胡乔木组织修改。胡的修改稿有很大改动，其中一大特点是编了十段毛泽东在文革前论述科学技术的语录。这是用来挡火的。这个文件转给毛泽东后，被退了回来，未置可否。后来被“四人帮”批判的是胡耀邦那份没有毛主席语录的稿子。《工业二十条》由计委起草。胡乔木、吴冷西、于光远、邓力群等参与了修改。《论总纲》是胡乔木分配给邓力群的任务。打算全面宣传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准备在《思想战线》创刊号上发表。胡乔木对邓力群起草的《论总纲》第一稿不满意，认为太尖锐，后又组织了一

些人起草。这三个文件系统地反映了邓小平治理整顿期间的精神，所以遭到“四人帮”的强烈反感。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四人帮”诬为“三棵大毒草”遭到猛烈批判。

#### ◇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

邓小平治理整顿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毛泽东的支持分不开。但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当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尤其是开始涉及毛泽东不想触及的环节时，矛盾就显露出来。1975年10月，胡乔木托邓小平转的清华大学刘冰告迟群和谢静宜的信，成为引爆的导火线。毛泽东对邓小平转的这封信大为恼火，批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后来公布这段谈话时加上一句：“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11月初起，邓小平在政治局内遭到反复批评。11月20日，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委婉地拒绝了。11月24日，毛泽东召集了有100多人参加的会议，说要向一些老同志“打招呼”。后来印发了一个23号文件：《关于转发〈打招呼讲话要点〉的通知》。讲话要点主要除了谈刘冰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它的定性，说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打招呼的目的是“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12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席卷全国。1976年2月，接替周恩来代总理的华国锋，在毛泽东授意下召开了两次17个省市领导参加的打招呼会议，要求各级领导深入揭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4月的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胡乔木受到很大的冲击。政研室被诬为“邓记谣言公司”，胡乔木被诬为“邓记谣言公司的副总经理”“邓小平复辟翻案的黑干将”。就在毛泽东批示刘冰的信后，国务院就此召开专门会议，特意把胡乔木、胡耀邦等人找去传达了 this 批示，并向他们打了招呼，要他们做检讨。紧接着又开政治局会议，上纲上线地批评邓小平的同时，也批评了胡乔木等人。江青在会上尖锐地批评胡乔木参加了反对毛泽东的活动，是对毛泽东的忘恩负义。11月24日的“打招呼”会议在政研室传达后，政研室就开展了几次批评与自我批评。胡乔木是重点斗争对象。尤其是李鑫，说胡乔木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一窍不通，还骂他“是个什么玩意儿”。会上责成胡乔木认真交代，认真揭发。胡乔木当时“情绪很坏，身体也不好，有时竟不想活了”。原在政研室工作的郑惠也回忆，当时胡乔木精神完全垮了，我们都没想到他这样经受不住。1976年2月，政研室资料员农伟雄通过姚文元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揭发信，说胡乔木积极鼓吹“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来又按兵不动，捂盖子，要求中央派得力干部来领导运动。毛泽东亲自批示：“印发政治局送胡乔木一份”。1976年2月召开的打招呼会议，胡乔木和农伟雄参加了。姚文元要农伟雄“把政研室的运动搞起来”，对胡乔木说“你的任务就是揭发”。农伟雄在“四人帮”的支持下，主持了政研室的揭批活动，先后发动了7次揭批高潮。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是属犯严重错误的对象。在强大压力下，为了过关，胡乔木被迫起来揭发邓小平，除了在政研室两次口头揭发外，他还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详细的揭发材料。

胡乔木的口头交代和书面揭发材料，被冯兰瑞收进了她的《别有人间行路难——198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理论风云及其他》一书中。原在政治研究室工作的胡绩伟，在其所著《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书中也有所披露。胡乔木的揭发材料由三部分组成：一是1976年2月23日胡乔木在政治研究室全体大会上的揭发和交代；二是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写的18条揭发邓小平的材料；三是胡乔木1976年4月3日在政治研究室全体大

会上的揭发和交代。

1976年2月23日，胡乔木在政治研究室全体大会上口头揭发和交代时，首先说：“我秉承这个最大走资派的意旨，在政治研究室积极执行了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成为他所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积极参加者，鼓吹者。”“我决心与最大的走资派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决裂，坚决回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接下来，胡乔木检查交代了在政治研究室工作期间的6个问题：一是政治研究室的任务和组织问题；二是收集有关文教材料问题；三是代管学部和筹备学部刊物问题；四是《科学院汇报提纲》问题；五是三项指示文章和《水浒》文章问题；六是转信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政治研究室的任务和组织问题”，胡乔木说：“政治研究室是最大走资派提议成立的，但是它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最大走资派从没有正式规定过。……同政治研究室被他和他的忠实追随者我利用来刮右倾翻案风有很重要的关系。……我紧跟着最大走资派的指挥棒转，把政治研究室的工作往完全错误的方向上引，往修正主义路线上引。这是我今天感到对毛主席、对党、对政治研究室全体同志非常痛心的严重错误。”胡乔木还说：1975年10月，邓小平开始受批判时，自己就“建议政研室今后要吸收一些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他马上摇头说不要，吸收青年就行了，这还是他6月间说的老话”。在谈到“收集有关文教材料问题”时，胡乔木说邓小平并不是真要研究文化战线的问题，只是利用政研室作为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刮右倾翻案风的工具的一个开端。还说邓确是曾想要通过政研室抓出版工作，在出版工作上刮右倾翻案风。然后，胡乔木检查了自己在关于收集文教材料活动以及有关出版工作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在谈到“代管学部和筹备学部刊物问题”时，胡乔木说：“最大走资派所以要抓学部，实际上就在于想办一个能由他指挥的刊物，也就是要办一个宣传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刊物，来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等等。应该说，胡乔木的揭发除了交代事实外，通篇用了许多上纲上线的语言。

1976年3月2日，胡乔木给毛泽东私自递交了揭发邓小平的18条材料。这18条材料是：“一九七五年一月谈话”；“一九七五年六月谈话”；“政治研究室是干什么的和怎样成立的”；论《十大关系》的编辑情况；“‘路线是空的’等等”；“关于双百方针和收集文教材料问题”；“关于代管学部和要办学部刊物问题”；“关于两部电影”；“‘高喊反复辟者就是复辟者’等等”；“关于‘党的作风’问题”；“社会主义不是吹出来的”；“关于评论《水浒》”；“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教育革命”；“两封未转的信及其他”；“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的一次谈话”；“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的又一次谈话”（第十八条在冯书中略去——笔者注）。胡绩伟的书中补充了一些冯书中略去的内容。如：第三条中，胡乔木说：“在毛主席批准我参加《毛泽东选集》整理工作以后，他（指邓）通知了我。但是毛主席同时对我过去在这一工作中所表现的主观主义、狂妄自大、往往擅自改动主席的著作，以自己的思想篡改主席思想的严重错误作了严厉批评。邓却没有正式通知我，要我防老病复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主席说你‘有时很固执’，‘提了过去的老话’。他反而对我说什么‘毛选的稿子，文字上一概由你个人负责’，‘你定了稿由我送主席审查’等等。”胡乔木还揭发说：“每次《毛泽东选集》整理稿送他以后，他表面上在一段时间里也召集我们开会议一下，但只是走过场，他没有认真下功夫。”还说：“他常常利用这种机会鼓吹他的修正主义路线谬论。”第四条中，胡乔木说：“七月上旬，在读《毛泽东选集》第一篇《论十大关系》时，他（指邓小平）就借题发挥地说：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又说：‘路线不是空喊。’”“他还说，这篇文章在经毛主席审阅同意后，应当发给全党讨论。这是理论学习的好材料。不学习毛主席的这些著作，全国的理论学习怎样深入得下去？”接下来，胡乔木就批判说：“《论十大关系》当然是毛主席非常重要的著作，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但是无论如何，决不应用它来打乱和代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示的学习。他的这个阴谋被伟大领袖毛主席识破了，没有得逞，但是这确实暴露了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政治本质和破坏学习毛主席理论指示的险恶用心。”

胡乔木1976年4月3日在政治研究室全体大会上的口头揭发和交代，一条条交代了从1975年1月到1976年1月一年间，邓小平和他的23次接触。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后，据郑惠回忆：“乔木想参加追悼会，江青他们不让他参加。他心里很难过，他和毛主席感情很深。乔木就写了一封信给江青。这封信别人都不知道，‘四人帮’被抓时，在江青的办公桌里搜出来了。这就成了大事。有人认为这是乔木向江青献忠心的表示。因为想参加追悼会，用不着写信给江青，可以写给中央办公厅。这就形成华国锋上来以后当时中央领导层对乔木的看法。”

邓力群说：“乔木说，他要求参加向主席遗体告别，就写了一封信给汪东兴并江青，其中有一句话：对于江青在政治局对我的教导和批判，终生难忘。”邓力群认为，这个事情导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一度要解散政治研究室：“1977年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开会，宣布政治研究室解散。什么原因呢？就是乔木写的那封信。说主席去世后，乔木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经过汪东兴转的，是‘效忠信’，表示效忠‘四人帮’。”

#### ◇ 文革结束后老干部对胡乔木的态度

文革结束后，政研室对揭批邓小平的运动做了一个总结。其中谈道：“但是，也要指出，7位负责同志在揭发批判中，不同程度上都说了过头话。有些超出了必要的范围，有些上纲出了格；在这一方面，胡乔木同志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的揭发批判材料中，表现得很明显。对于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需要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鉴戒。”

的确，政研室7个负责人当中，胡乔木受的压力最大，也是揭批最出格的一个。政研室其他人都是无可奈何，被迫违心地说了一些表态而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话。胡乔木的揭发材料却不同。他主要是回顾了1975年1月至1976年1月一年间，邓小平与他的23次谈话和交给的任务。材料基本在陈述事实，没有实质性的要害内容，也没有添枝加叶的捏造，但为了过关，胡乔木用了很多“上纲上线”的言辞。邓力群认为，胡乔木和邓小平私下谈话时，谈论“四人帮”的事应该不会少，但胡乔木一件也没有揭发。胡乔木后来给政研室的人解释他揭发的原因：我就是想挽回在毛主席那里的信任。我看到主席下决心批邓小平了，就写了揭发材料。胡乔木的夫人谷羽说，胡乔木就是想要对得起主席，想报答主席，主席文革中有恩于他。

“四人帮”垮台后，高级干部对胡乔木揭发邓小平都表达了很大的不满。叶剑英说：“老干部，在主席身边那么多年，揭发邓小平，不能原谅。”余秋里说：“邓力群是个汉子，每个观点，每句话都完全负责啊，胡乔木就不是这个样子。”李先念、陈锡联对邓力群说：你们顶住了，胡乔木就顶不住啊。罗瑞卿有一次同邓力群说：你们的胡乔木怎么能这样干。胡耀邦对胡乔木也是意见很大。

不过，作为当事人的邓小平原谅了胡乔木。1977年5月，胡乔木托王震、邓力群、于光远他们给邓小平带了一封检讨信。邓小平说：不看了，信你带回去。我就讲，乔木在事实揭发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问题在于上纲厉害了一点，这个不好。邓小平还说：“这没什么，对这事我没有介意。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当谈到有人认为胡乔木政治动摇时，邓小平说：“乔木不是政治上动摇，是软弱。”“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换意见。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使舵的不同。批我厉害得多的人有的是。有的甚至说我五毒俱全。”邓小平以政治家的宽大胸襟原谅了胡乔木，他当然知道，当下正是用人之际，自己需要胡乔木这样的笔杆子。

□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3期

~~~~~  
【不堪回首】

谭厚兰曲阜“讨孔”纪实

• 张顺清 •

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的女学生谭厚兰，时为北师大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公社”头头。她以“讨孔”总指挥的身份来到山东省曲阜县，掀起了一场疯狂的“讨孔”运动，使曲阜众多的文物古迹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

其时，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因为可以免票乘火车，便有大批学生走出了校门，出现了全国性的红卫兵（“红卫兵”是遍及全国的以大、中学校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的名称。最早于1966年5月下旬在北京出现，其意为“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大串联，学校已无正常工作可做。就是在此情势之下，我得以目睹了谭厚兰一伙儿砸碑、开大会、挖坟掘墓等种种“讨孔”的罪恶行径。

一、成立“讨孔联络站”

1966年11月9日，谭厚兰率领着北师大在天安门广场宣誓要“打倒孔家店”的200余名红卫兵，千里迢迢，到达曲阜，受到了曲阜师范学院、山东水利学校、曲阜师范学校、曲阜一中等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的热烈欢迎。

谭厚兰，个子不高，戴着眼镜，扎着两条小辫子，穿着当时流行于大江南北的红卫兵装——草绿色的军式衣裤，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她的面部表情，常常是凝重的，好像时时处处都为透出自己的威严似的。

谭厚兰深知，她要在曲阜“讨孔”，是必须得到曲阜当地人、当地组织的认可、支持和参与的。否则，就会势孤力单，甚至寸步难行，无法成其事。因此，她到曲阜后，首先联合当地的大、中学校的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了“全国红卫兵彻底捣毁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以下简称“讨孔联络站”）。不用说，谭厚兰当然是第一领导人。

在北京，谭厚兰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并称为首都的“五大学生领袖”。而今，在曲阜，她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统领曲阜等地的红卫兵组织和其他人员，恣意妄为了。

“讨孔联络站”的成立，使谭厚兰有了出面指挥“讨孔”的名分和力量，使曲阜的一些“讨孔”组织和人员有了归属和领袖。就这样，京城内外一些“讨孔”的邪恶力量便纠合在一起了。一时之间，犹如凶猛的浊浪，在古老的曲阜大地上翻滚。

二、召开“讨孔”誓师大会

在谭厚兰来曲阜之前，当地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也有一些“讨孔”活动，但那只是些小动作。他们最大的闹腾，也就是1966年8月下旬那些时日，几百名红卫兵跑到孔府门前，唱唱歌，喊喊口号，张贴几张“打倒孔老二”“捣毁孔家店”的大字标语。他们甚至连孔府的大门也进不

去。

谭厚兰到曲阜之后，形势大变。11月15日，上午，孔府门前。在这里，聚集着北师大和曲阜大、中学校的部分红卫兵，以及来曲阜串联的全国各地的一些红卫兵，还有当地的一些有组织和无组织的民众。据《济宁拨乱反正》（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一书记载，共有“2000余人”。

在这里，“讨孔联络站”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在这里，红卫兵宣读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告全国人民书》等文告，公然诬蔑国务院1961年3月4日在曲阜“三孔”等处所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是“讨孔”的绊脚石。他们挥动大铁锤，将国务院立在孔府大门西侧的石碑砸毁了。随后，他们又将国务院立在孔庙、孔林和鲁国故城等处的石碑也统统砸毁了。

砸了碑，对谭厚兰来说，就是搬掉了“讨孔”的绊脚石，并第一次成功地行使了“讨孔”总指挥的职权，展现了自己的权威。从此，她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了。而对于当地的红卫兵来说，好似第一次上阵的战士所经受的战斗洗礼。在敢想敢干的北师大红卫兵面前，一方面他们感到自愧不如；而另一方面，他们眼见了北师大红卫兵的作为，不仅增强了胆气，并认识和找到了释放“讨孔”能量的方向和处所。从这个意义上说，砸碑也为日后北师大红卫兵撤回北京，由当地红卫兵全面接手“讨孔联络站”的事体，继续“讨孔”，开始做着人才上的准备。

三、10万人的“讨孔”大会

1966年11月28日和29日，在曲阜师范学院的操场上，“讨孔联络站”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

参加大会的，除了曲阜师院及其附中、山东水利学校、曲阜师范学校、曲阜一中等各校的红卫兵之外，还有曲阜县各人民公社调集来的大批农民和从工厂抽调的工人，共约10万人。

谭厚兰的讲话和代表发言如出一辙，都是诬说孔子思想反动、“孔家店”有罪，并指责中共曲阜县委和中共山东省委的某些领导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尊孔复古，保护“孔家店”，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应该公开检讨，向人民请罪，向毛主席请罪。谭厚兰和发言的代表都表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捣毁“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最后，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四、“孔子”游街

“讨孔”大会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拉着孔子像游街示众。大会期间，红卫兵就把孔庙大成殿里的孔子塑像头放到解放牌大卡车的车厢正前面了。高大的头像上，还戴着一顶高帽子，上写着“头号大坏蛋孔老二”。

有关资料记载，此像塑于清代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像体为坐姿，在一个巨大的雕龙贴金神龛之内。其高九尺六寸，腰大十围，头戴十二旒之冕，身着十二章之服，手捧镇圭于胸前，表现了孔子“温而厉、威而猛、恭而安”的神态。

当年，孔子出行周游列国时，坐的是牛拉的车。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步入冥界2445年之后，其泥巴塑像竟能乘着国产的大汽车，四处去风光。而且，这次陪着他的头像游街串巷

的，也不再是颜回、子贡、子路等众弟子，而是20世纪研究其思想的专家学者。他们是余修（山东省副省长）、周予同（复旦大学教授）、严北溟（复旦大学教授）、高赞非（曲阜师范学院首任院长）等。他们都是1962年11月在济南召开的“孔子学术讨论会”的出席者。现在，他们被红卫兵揪来，脖子上挂着姓名上画有红“×”的大牌子，作为孔子的“孝子贤孙”，同车陪着孔子像游街示众。

不能不说的是，周予同是拖着病体从上海来曲阜作陪的。他的学生孙言诚先生在其文章《复旦“二周”：周谷城、周予同》中写道：“周予同有心脏病，上课都要按时吃药。文革中因病重瘫痪了，就这样还被拉到曲阜批斗。由于腿脚不便，批斗后掉进一条沟里爬不起来，没有人去拉他一把。最后，还是一同挨批的严北溟先生从沟里把他扶了起来。我不能想象心目中那样儒雅的周先生，怎样爬上了那条屈辱的沟坎。”（《历史学家茶座》第七辑）

汽车出曲阜师院南大门，折而向东，在曲阜城内的古老街道上，缓缓地行进。车后，还有大批红卫兵列队随行。开道的宣传车上安着高音大喇叭，一路响个不停。不是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孔老二”之类的口号，就是介绍陪游的“牛鬼蛇神”。街道两边，站立着许多怀有不同心态的观看者，多是当地的民众。

游街完毕，汽车开到孔林墙外西南角。那里，在一条小沟底，正焚烧着从孔庙、孔府等处拉来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等各种匾额文物，大火熊熊。孔子的头像也被掀到火海里，接受烧烤。

五、开挖孔子墓

与10万人的“讨孔”大会相配合，谭厚兰等人组织的另一个“讨孔”的重大恶行，就是到孔林去扒坟掘墓。大会是务虚，挖坟是务实，虚实并举，策划周密。

挖谁的坟墓？流传的说法是挖前三代和后三代。实际上，挖的是孔子、孔鲤、孔伋祖孙三代和孔祥珂、孔令贻后两代的坟墓，并拉倒砸毁了大批石碑、华表等物。

因年代久远，在前三代的墓中，虽下挖了深深的坑穴，但既未见骸骨，也没出土任何文物之类的东西。在后两代衍圣公墓穴和棺槨中，挖出了不少东西。“讨孔联络站”主办的《讨孔战报》1966年11月30日登载：从孔令贻的坟墓中，取出黄金630克、碎银250克、银元宝1000克、玛瑙玉器等84件。

可以说，谭厚兰指挥挖坟掘墓，干出这伤天害理之事，是奉某些大人物之命去完成的一项政治任务，以满足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但随之而来的事实证明，她也打开了一个千百年来平常之人不能触碰的禁区，引发了规模更大的扒坟活动，招致了更大的破坏。

孔令贻墓中出土的金银财宝，对亲眼见过的或虽没见到但听说过的某些人来说，成为一种很大的诱惑，激发了他们试图大发横财的欲望和行动。过去没有想或不敢想的，现在敢想了；过去没想干或不敢干的现在敢干了。“向孔林进军”“一夜扒架拖拉机”，是孔林周围一些公社生产大队的行动口号和追求目标。还有的学校和单位，到孔林去建了农场，搞生产。

就这样，一场后续的大破坏再次降临了孔林。曲阜市的统计资料指出：在占地3000亩的孔林里，10万余座坟墓，被挖了2000余座；42000多株树木，伐了万余株；4000多通墓碑，被拉倒的近千块。

实际上，扒坟之事并不限于孔林。曲阜境内的孟母林、梁公林、少昊陵、东西颜林等，都遭到严重破坏。

《游读曲阜》（泰山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说，曲阜城东的西颜林是颜氏家族的一处大型墓葬区，占地面积190000平方米，因葬有晋唐以来的颜氏侍郎13人，故称“颜侍郎林”（简称“侍郎林”）。林区中有柏、楷等古树1770余株，碑刻300余通。文革期间，“平墓毁林，使整个墓区荡然无存”。

六、“讨孔”，有报又有歌

为“讨孔”，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井冈山公社创办了《讨孔战报》，编写了“讨孔”歌曲。《讨孔战报》的创刊号是1966年11月10日出版的，其主要内容是：

- 1、发刊词——捣毁孔家店，彻底闹革命，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
- 2、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
- 3、告全国革命人民书
- 4、井冈山红卫兵战士满怀革命豪情在天安门宣誓
- 5、捣毁孔家店（歌曲）

谭厚兰来到曲阜之后，便指派北师大的红卫兵宣传队，在城区，在农村，到处演唱“讨孔”歌曲，吸引民众，制造“讨孔”舆论。这里，暂且略去歌的曲谱，将其词抄录出来，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其词是：

孔家店阎王殿，血债累累罪恶滔天。文化革命战鼓响，孔家店的末日在今天！捣毁孔家店，砸烂孔家店！孔老二大坏蛋，反动透顶阴魂不散。毛泽东思想红旗飘，孔老二的末日在眼前！打倒孔老二，火烧孔老二！向“四旧”势力齐开战，齐开战！

1966年11月14日，《讨孔战报》第二期出版。从该期起，其主办单位改为“讨孔联络站”。也就是从此期开始，曲阜师院等学校便有师生参与了《讨孔战报》的采写、编辑、印发等具体工作，直到终了。1967年8月底，《讨孔战报》停刊，至此，历时10个月的《讨孔战报》，共出版了23期。

七、谭厚兰的背后

谭厚兰，一个在读的京城大学生，带着几百红卫兵，就敢明目张胆地把国务院保护“三孔”等重点文物单位的石碑砸毁，大张旗鼓地进行“讨孔”活动，左右横行，把曲阜搞了个地覆天翻。

谭厚兰哪来如此的包天大胆？哪来如此搅天动地的权力？其实，人们大都清楚，谭厚兰有恃无恐的曲阜之行，是大有来头的。其背后肯定有人，有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大人物在指使着她、支持着她。这个人就是能够左右文革局势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对此，谭厚兰及其同伴也从不隐瞒。他们多次讲过，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他们的。而且，就在他们刚到曲阜没几天，陈伯达就发来了“孔像可拉，孔墓可挖”等内容的电报指示。因此，谭厚兰来到曲阜之后，目标明确，行动果决，邪气十足，狂妄至极。那时，陈伯达正是炙手可热之人。在不明就里之时，谁个敢贸然拂其意，又有谁个能够阻挡得了！

八、她会遗臭万年吗？

而今，在周公庙第三进院落的达孝门洞西侧，装置着一块谭厚兰“讨孔”时被砸毁的碑石。碑的正面朝北，其上的文字显示，那原是国务院1961年3月4日公布曲阜鲁国故城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石碑缺损了右上角。被砸去的是第一行的“位”字和“单”字的右上角、第二行的“城”字和“故”字的右上角。1981年修缮周公庙时，在此残碑的背面加刻了李予昂的诗，并将其移置于此。

李予昂，曾任山东省副省长。碑上的刻文记载，1980年5月中旬，他陪客人到曲阜访问，见到文物古迹惨遭破坏的景象，“愤慨万分”，遂成诗一首：

万恶“四人帮”，十年逞逆狂。
少昊像倾碎，鲁故城拆光。
三孔大破毁，周庙受灾殃。
贼罪臭万年，历史诛巨奸。
首凶陈伯达，作伥谭厚兰。
留此残碑在，铁证代代传。

此诗刻在残碑上，真是别有深意。

1978年5月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视察曲阜时说：“对破坏文物的首要分子要严惩”，“谭厚兰破坏‘三孔’文物该杀。”（见《齐鲁晚报》2014年1月9日《青未了》栏目）。

谭厚兰领受了将令，挥舞着尚方宝剑，疯狂地“讨孔”，大肆毁坏文物，给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文革后，曲阜的文物保护单位，由原来的338处锐减为87处。

谭厚兰有罪，有大罪，的确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另一方面，就谭厚兰个人来说，她也是一个下场悲惨的文革殉葬品。1970年6月，有关部门开始清算她的问题。数年后，因患癌症医治无效，还未及享受人生的美好，她就过早地离世了。

□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

~~~~~

【永志不忘】

## 一所高校清查“五一六”的惨剧

• 朱子南 •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

江苏省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滞后于其他一些省、市、自治区，但一经发动，其打击面之宽则已到骇人的程度。据李海文《彭冲在“文革”中》一文所说，“江苏清查‘五一六’时，被

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竟有13万余人。”（2013年第3期《世纪》）。

我所在单位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据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苏州大学校史》记载：自1971年2月开始的“深挖‘五一六’”运动，首先认定“江苏师院是‘五一六’大本营”。《校史》写道：这场“运动时间之长，受迫害的人之多，后果之严重，是学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据《校史》记载，定性为“五一六”的有396人，而其时，全校教职员仅688人。列为“五一六”的，占教职员总数的57.5%。为加强清查“五一六”，又进驻了第二批军宣队。

1971年，在春节过后的2月10日，江苏师院运动领导小组召开了全院教职员大会（学生已全部分配出去，只留下少数几个造反派以借用的名义留校作为运动的骨干），宣布开始深挖“五一六”分子。运动领导小组负责人说了，江苏师院的“五一六”是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不“深挖”是无法把他们揪出来的；也宣布实行“三集中”，即集中住宿、集中学习、集中揭发交代问题。于是，不管年老与家中有小孩需要照顾的，一律搬起行李住进了校内。如中文系教师翁寿元已去农场劳动，同在中文系的其妻子孙琪被“集中”在校，三个孩子，大的12岁，小的才8岁，只能由大的孩子当家了。学生离校后，有的是双人床，以中文系来说，搬到文科楼便是。全校编成了五个连队，中文系、外语系为一个连队，在农场劳动的为一个连队，校办、后勤人员与历史、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各系分编为三个连队，2月12日，但见教职员纷纷把行李搬到了各自集中的地点，除了运动的骨干可以自由返家照料孩子外，其余的人员开始了漫长的每天早、中、晚开会，包括周日、法定假日无休息天的封闭式生活。中文系教师潘某在其出版的“自订年谱”中，称之为“关门打狗”，一语道出了这“三集中”的要害所在。

其中一个连队在校办的尹山湖农场。这农场原为劳改农场，被劳改的人其时已西迁，这就空出来了，由苏州市划拨给了江苏师院作为五七干校之用。1971年春节过后，由校内各系抽调人员来此。连队下设3个排，每排下设3个班，每班分别住在原劳改人员住的草顶砖墙的屋子里，由校内拉来了双人床。不久，深挖“五一六”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被隔离，他们中的老弱人员大都已年过六旬，其中有在东吴大学教过蒋纬国的历史系教授张梦白，以及金轮海、王本慈、钱兆隆等人。被审查的人中有袁沧洲（后任苏州大学副校长）、王丕清（后任苏州大学教务处长）、徐鳌泉（后任苏州大学数学系党总支部书记）、陈学基（后任常熟师专党委副书记）、胡振民（后任苏州大学后勤处副处级干部）等，从上述名单中也可见到，被审查者大都是学校中的有为之士，是反抗与抵制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以及他们在江苏师院的帮凶的。他们直到1972年春、夏之时，才陆续被放出来，其中就有被挨打的经历。如作为“动力”的中文系教师李某就曾扬言：“别以为我不会打人，我就打过！”

在农场，同在校本部一样无休息天，有近三个月时间无法理发，直到一天外地来了个剃头担子，才理上了发。

在农场劳动，抢收抢种（双抢）双季稻，天不亮就要起床，天黑了才能回来冲洗一下。挑泥担，并非是农民用的如半个蚌壳状的竹编篮子，而是大粪桶，这一桶有近一百多斤吧，却要在水田里挑着走，挪动一步都困难，但也得坚持——参加劳动的，大都是另类啊！

#### ◇ 摧残身心，捏造“材料”

数学系教师周瑛的遭遇非常惨。粉碎“四人帮”后，周瑛对我谈起他如何被折磨的。他被认定为学校“五一六”的组织部长，关押在窗户糊上纸的房间，因之不见天日有两年之久。提审、暴打，在无可奈何之下，他承认了自己是“组织部长”，交代了一份163人名单。这已

经是他认识的校内人员的极限了，但还是遭暴打，审讯人员恶声说：才这么一点，倒过来还差不多！于是，周瑛在记忆中搜搜刮刮，把不认识其人而知道名字的都开列了上去，这才凑成了163人倒过来的361人。专案组不知从哪里来的消息，凡参加“五一六”的都有“登记表”，于是向周瑛追查这“登记表”的下落。几经殴打，周瑛说了，“埋在校园东边的小山坡上了”。午夜，专案人员打着手电押着周瑛去挖掘。没有登记表又何能挖掘出来？押回隔离室打手们又对他乱打乱踢。他在没办法中找到了一个办法：我可以交代这“登记表”的存放地点，但要直接跟军宣队的负责人说。打手们都是学校里的人员，见他这么神秘地说这一番话，就汇报上去了。

军宣队的负责人在校内主事者的陪同下来了。周瑛要求单独跟军宣队负责人谈。这负责人一挥手让校内的人退出了房间。周瑛这才说：是学校“五一六”负责人邵某（“文革”前为苏州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文革”后任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说的：这登记表是放在红色保险箱里。问：什么红色保险箱？答：放在学校革委会徐副主任（“文革”前为外语系党总支副书记，“文革”风暴一起就造反）那里了，这谁也不会怀疑，所以叫红色保险箱。问：过去为什么不交代？答：来提审我的人中就有隐藏很深的“五一六”，我怕他们杀人灭口。周瑛的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就因肝损伤而去世。

时在校保卫处工作、“文革”结束后任保卫处处长的朱永生和他的妻子汪福珍，在深挖“五一六”中被分别隔离了。汪福珍已怀孕。她拒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看管她的人说，只要你交代了，可以每餐给你买大块肉或大排骨或大肉圆，不交代，只能喝青菜汤。于是，尽管在孕期需要营养，却只能是每餐2分钱的菜汤，直到分娩。在医院分娩后，继续带了婴儿被隔离，历时一年之久。待到朱永生、汪福珍被放出隔离室，朱永生才见到已一岁的孩子，这也才听到孩子第一声叫爸爸。朱永生对我说，这孩子就像《红岩》中的“小萝卜头”，一起同妈妈坐牢了！

历史系的梅国祥（粉碎“四人帮”后任学校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处处长）也是始终不作交代的，被认为是“顽固分子”。他说，这隔离，没有放风，冬天也只是一条薄棉被，得了气管炎，现在还常常发作。一天一瓶热水，连喝带洗。吃的是1分钱的萝卜干或是2分钱的菜汤。挨打，罚跪是常事。有一男性审查人员是特别凶的，而沈某、曹某稍好一些。这种日子过了有近两年。梅国祥有信念，不能死。冷了，就在室内跑步，可以取暖。他相信这种局面肯定会转变的。

施压之外，是骗、诱。有一教师对我说过，审查人员要他交代“五一六”，子虚乌有的事，他无从交代。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天，又提审了。在隔离室内，隔着对面的两排课桌，审讯人说：你还不交代？说着，用手挥着材料道：“你的材料都在这里！”说完把这材料往课桌的桌肚里一放：“你好好考虑吧，我待会儿再来。”那个教师开始还坐着，可过了许久也未见审讯人回来。胆子大了一些，悄悄过去把桌肚里的材料拿出来看了。果然是别人的揭发材料。他把这材料看了几遍，记熟了。待到第二天审讯时，那个教师就说了：“我交代。”他把材料中的东西复述了一遍后，审讯人说：“你终于从‘泥坑’中走出来了。”这“泥坑”是当时深挖“五一六”的专用术语。在1972年春节过后，那个教师被下放到校办的尹山农场劳动了近一年，直到这年年底。

#### ◇ 荒唐闹剧，大肆上演

为显示深挖“五一六”的战果，校运动领导小组在大礼堂开了一个“五一六”分子坦白大会。上台交代的有中文系教师王锡良（“文革”后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等。王锡良和我同一个系，他的交代当然为我所关注，但听他说了，是谁介绍他参加的，最后说“我跌入了‘五一六’反革命泥坑”。听来听去也没有听出个实质性的东西，都是虚的。原来他是把参加中文系的一派

群众组织“红五月”作为“五一六”交代了。如此儿戏，居然也被运动领导小组作为“战果”大肆宣扬。

时过两个月，在大饭厅召开了又一次深挖“五一六”大会，最引人注目的，说是挖出了一个“反革命杀人灭口集团”，主犯为中文系总支书记邵玉彬、外语系总支书记王春元（1944年参加革命，“文革”后任江苏师院革委会副主任、苏州大学副校长）。有人上台分别揭发、控诉邵玉彬、王春元的罪行。但我当时听了之后就不相信，几个揭发者的发言，对他们的“罪行”连细节都是完全相同的，这分明出于同一个模子。

在当时，这反革命杀人灭口集团完全是一场闹剧，但主持其事的军宣队、由造反派掌控的院革委会还上报苏州市公检法要求判处邵玉彬、王春元死刑。这在《苏州大学校史》中也有记载：“在这场运动中，还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杀人灭口’假案，把十余名干部、教师打成‘杀人犯’，其中两位老干部被诬指为‘杀人灭口集团’的主犯，竟然上报公、检、法，要判处他们‘死刑’。”

2014年2月2日（农历年初三）上午，我去王春元家。谈到1971年“反革命杀人灭口”一案，他记忆犹新，说专案组咬定校内的归行素、谭家琛、何祚永作为“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是他们谋害的。归行素是1968年跳井自杀的，当时苏州市公检法来验过尸，结论明确，确系跳井自杀。归行素于抗战中期入党，长期坚持在常熟从事地下工作。此时，作为“叛徒”被批斗了。谭家琛为图书馆职员，被作为国民党特务批斗，上吊自杀。何祚永于解放前在东吴大学参加地下党，被揭发与顾佩兰（后任苏州大学党委副书记）、江村（后任苏州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为反革命小集团，何祚永于1968年跳运河自杀。现在均作为邵玉彬、王春元杀人灭口的罪行了。这一“集团”被残酷批斗的，还有“骨干”徐纪忠（后为苏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王耀良（后为江苏省司法厅副厅长），对他们来说，都有不堪回首的噩梦经历。

专案人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伎俩是层出不穷的。1972年初，唐某、陆某找到隔离中的王春元，要他把《毛主席语录》拿出来，撕去了林彪的“再版前言”，说：“你们的黑后台垮台了，你还不交代！”而以往，是说他们疯狂反对林副主席的。

直到1972年12月，王春元才被放回家。他去洗澡，无法冲洗了，身体太虚；有一段时间也无法直面阳光，长期在密闭的室内，眼睛已无法面对阳光的刺激。邵玉彬已去世，无法再请他口述当年的遭遇了。对受残酷迫害的人来说，打几下耳光是极轻的惩罚。据中文系教师王永健对我说，他亲眼见到这一幕：中文系革委会一负责人责令中文系教师王迈写交代。结果只见一张白纸。他劈头就问：“写交代了没有？”王迈答：“没有。”于是，两记耳光。

#### ◇ 不堪忍辱，多人自杀

令人发指的，还有人利用审讯之机侮辱女性教师。据看管一位女教师的朱孔怀说，一天，这位女教师突然在室内赤身裸体大喊：“你们来看吧！”这是她发现有审讯人在室外偷窥。这位女教师被关在小屋中一年半，历经了两个夏天。无法洗澡，只能在室内用水擦洗，这就给道德败坏者有了可乘之机。

专案人员孙某还曾利用单独提审之机强奸了一位女教师。当时这位女教师就说要控告孙某，孙某则说：你去告吧，我不怕！又说：上面相信谁的，相信你还是相信我？在“四人帮”爪牙控制下的江苏师院，确实也有冤无处申。受此侮辱，这位女教师痛不欲生，曾自杀三次，一次吞食了晾衣夹子上拆下来的铁丝弹簧，一次吞食了破热水瓶胆的碎片，都被抢救过来了；一次

跳楼，又未成。

1977年初，江苏省委、苏州市委已派工作组进驻江苏师院，这位女教师找到她的大学同学王海兴，请他代笔，写了控告信，并由王海兴陪同，把这封控告信交给了工作组副组长俞明（后任苏州市委宣传部部长、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找孙某谈，孙某拒不认罪，认为没有证据，是无法处理他的。这位女教师提出了孙某私密处有一特殊标记作证词，这就可以认定。工作组即把材料移送法院，有了确证，法院判处孙某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这明显是轻判了，但当时清查“文革”中三种人的工作尚未启动，帮派势力仍在。一帮小兄弟还怂恿孙某上诉，结果江苏省高院认为孙某不认罪，非但强奸，且造成被害人3次自杀（未遂）的后果，改判徒刑5年。这位女教师无法在原单位工作，不久要求调离了江苏师院这处伤心之地。

据《苏州大学校史》记载，江苏师院有代表在出席1971年春夏之间举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作了《批判孔子“有教无类”》的发言，说“旧江苏师范学院，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五一六’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占全校教职员工的77%”。这也可见当时打击面之广了。据《苏州大学校史》记载：“‘文革’期间全院被迫害致死的师生员工有20人。”在深挖“五一六”的过程中被迫害致死的有5人（其中4人为中共党员）。

中文系1964年毕业留校任教的郁永琴（中共党员），性格开朗，待人友善，在深挖“五一六”中，于1971年9月上旬在文科楼三楼隔离室内自杀。据知情人说，当天专案组人员曾找她谈话。这谈话的内容，对郁永琴造成了什么压力，却是永远的谜了。隔离在二楼的李家钧（“文革”后任苏州大学政教系党总支书记）经常听到楼上郁永琴的哭声，不久，就传来了她的死讯。郁永琴于1968年结婚，被隔离时，第二个孩子出生不久，还让她带着孩子哺乳，后隔离升级，审查人员就让她婆婆把孩子接走了。哪知，这竟是永诀。

据化学系教师马经德对我说：他在隔离中，不堪忍受这非人的折磨，踩在粪桶上上吊自杀，很难受，这一难受，又使他清醒，不该这么死去，好在上吊前无法踢倒这粪桶，又踩着粪桶下来了。马经德曾在“文革”前作为江苏师院代表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

已经毕业分配，又被揪回的数学系毕业生裔英，被逼自杀。中文系毕业生刘沛，被揪回后，受长期折磨，被逼疯，神智失常，直到80年代初才逐渐恢复正常。不堪折磨而自杀的还有历史系教师王畅、物理系教师吴晓明、外语系教师李福林。

#### ◇ “四害”垮台，余毒难肃

终于，“四人帮”被粉碎了。学校由新来的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凡一在大礼堂宣布，校内没有一个“五一六”！在清查“四人帮”余党的活动时，苏州市紧跟“四人帮”、与王洪文勾结甚深的苏州市革委会头目华某、苏州武斗总指挥刘某等等都被逮捕了，判刑16年（均死于狱中）。

江苏师院也改组了院革委会。还未撤离的军宣队、工宣队与原院革委会负责人见形势变化，互相推诿。原院革委会负责人说主要是由军宣队、工宣队搞的，而军宣队、工宣队的负责人则说：材料不都是你们提供的！虽说材料基本上是由江苏师院的造反派提供的，但无所不用其极的审讯，军宣队能推卸责任？军宣队负责人张某对审讯对象谈话逼供，几次都说到：你不是“五一六”，我摘下帽徽、领章！原院革委会负责人徐某在未传达“四人帮”被捕前，已从时为苏州市民兵指挥部头目的刘某处得知这一消息。也由此可见，苏州市的帮派势力与王洪文在上海的党羽有着何等密切的联系。据有人揭发，徐某在回校路上就惊慌失措；回校后在老招待所内对人说，实在不行，就拉起队伍上山去打游击，足见这些人之惶恐与不甘心覆灭。苏州市的帮派势力让造反起家的江苏师院1967届毕业生某人任东山公社党委书记，在“四人帮”被粉碎

后，就准备武力对抗。粉碎“四人帮”后，其人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徐某畏罪自杀。

但是，批判“文革”中极左的错误以及清查深挖“五一六”中的种种非人的迫害行径，却因当时领导人的指示而停止了，并未得到认真的清理。一些帮派头目与打手也未得到应有的处理。但是，一些当年施害于人的，终因自己的为非作歹而自知无法再在江苏师院继续生存下去，而纷纷要求调离。

1984年11月，我在参加江苏省写作学会成立大会时，时在连云港职业大学任教的江苏师院1966届毕业生李怀志，听说我也与会，因在1966年9月9日在大礼堂批斗我，并与同班同学徐某来我宿舍抄家一事，来到我的房间，向我深深一鞠躬，表示了歉意。我当即原谅了他，并推荐他为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我为学会副会长）。

虽说已由凡一在全院教职员大会上宣布江苏师院没有一个“五一六”，但这算平反了么？当时就有汪福珍站起来发言指出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但没有下文。凡一在“文革”前是苏州市委副书记，“文革”中也被打倒，来江苏师院任职时“解放”不到两年，清查“五一六”也不是他的责任。但当时的牵制、阻力，也是明显存在的。

有文章提到，“铭记并向后代讲述这段历史是我们的责任”。1971年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了，当年的打手有的已不在人世，被迫害者有的也已逝去，尚存者，不少人已年过八旬，1964年、1965年毕业留校的教师也已年过古稀了。这一段历史，不该被湮没吧。

（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 原载《世纪》2015年第2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